

毛泽东三次接见

——陇东开明绅士徐廷昌

□董勇

徐廷昌,1879年生,甘肃合水县段家集乡人。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常驻参议、县政府委员。1940年到1944年曾三次赴革命圣地延安,受到毛泽东和边区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。

徐廷昌年少时父亲去世,母亲再嫁,孤苦伶仃,幸有远房叔祖收养,放牧为生。长大后,他白手起家,靠辛勤劳动,于25岁成家立业。虽然自幼寄人篱下,但他为人坦诚豪爽,豁达大度,凡事不拘小节,在乡邻中颇孚众望。妻子郭氏贤惠有德,有“佛慈孺人”之称,所生七男一女,经悉心教育皆步正道。

1929年,陇东发生极其罕见的大饥荒,饿殍遍野,民不聊生。当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时候,段家集乡(时属宁县)的郭、杜两乡绅却勾结当地土匪,抢劫财物,祸及乡邻。血气方刚的徐廷昌挺身而出,邀邻村郝孝雄等人赴宁县告状,为民请命。县署派兵围剿土匪,捕捉了匪首,安定了地方,放粮赈济,救活灾民,并将二乡绅革职,应民众请求,任命徐廷昌接任绅士。

徐廷昌虽然目不识丁,却有办事不忘之才。他在任8年,廉洁奉公,热心为民众办事,先后创办私塾两所,吸收贫民子弟入学,培养地方人才;组织民众修筑两处峁子隧道,疏通东西、南北车辆通道;积极参与上下8社知名人士倡导的立集活动,首次设立段家集集市,结束了方圆50里内无集市之现状;组办社火队,活跃文化生活,以内容丰富多采颇受群众欢迎。

徐廷昌家境殷实,周围邻居求助借贷,有求必应。穷人子女结婚困难,或解囊相助,或按户分摊,自承债权,被乡邻誉为“慈悲有德”之人。他虽身为绅士,却仍保持劳动本色,常粗衣淡食,不嗜不啻,虚心自重。

1932年春,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原山头村开展革命活动,

派人向徐廷昌筹措军资。来人以为鼎鼎有名的徐绅士必定穿着讲究,却没料到是早已见过面的身穿粗布棉袄之人。在咀头村,经刘志丹说服教育,徐廷昌对共产党、游击队的性质、宗旨有了新的认识,从心里愿与游击队合作共事。他与游击队情报人员单线联系,提供情报,使游击队多次准确地捕捉到敌人和土豪劣绅,筹集到枪支粮饷。他以此法,先后为游击队筹枪4支,筹集银洋布匹若干。

1934年冬,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(1932年12月24日,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)给养困难,刘志丹传话给徐廷昌,要他为红军筹备一笔过冬经费。徐廷昌慷慨受命,倾囊相助,卖掉自家的原地20亩,把筹得的经费让三子徐占荣送交部队。此时,革命正处于低潮,他却不避风险,常在群众中宣传革命,鼓励群众与红军靠拢。他说:“共产党、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,爱穷人,不欺人,我都不怕,你们怕啥哩!”当地不少青年在他的影响下,积极主动参加红军,逐步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36年,国民政府废除旧制,编排保、甲,改绅士为保长,徐廷昌力辞公职,民众上书挽留,便勉强让三子占荣接任保长。1937年,宁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,各地普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后方援助会,他又支持占荣辞去保长职务,从事后援会工作。

1940年初,“宁县摩擦”事件之后,国共重新划分区界,将段家集划归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。10月,陇东分区组织各县开明人士、社会贤达赴延安参观,徐廷昌应邀参加,在延安见到毛泽东、朱德、林伯渠等中央领导,聆听教诲。回到家乡后,他又积极创办村学和农民夜校,做出优异成绩。

1941年10月,合水县召开首届参议会,实行“三三制”,徐廷昌以“开明绅士”当选为县参议会常驻参议员,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及政权建设工作。11月,陕甘

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,徐廷昌以合水县参议会常驻参议员身份代表全县人民出席会议,第二次见到毛泽东。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合水建政工作,并与李鼎铭先生同组讨论。他在会上发言说:“我有七个儿子,准备上前线,政府要几个,我给几个。”博得与会者交口称赞。徐廷昌未食言,先后送4个儿子参军参政。

1944年11月,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“文化教育工作会议”,徐廷昌作为先进代表出席大会,第三次见到毛泽东。会后,毛泽东和他同桌进餐,看见他随手抓起撒落在饭桌上的米粒吃掉,称赞说:“此乃中国农民之美德也”,一时传为佳话。在这次大会上,他获得边区政府颁发的“热心办学”奖状和纪念品。他把主席的赞誉铭记在心,鞭策自己努力奋进。

1946年2月,在合水县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,徐廷昌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。徐廷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,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痛恨。

1947年春,陇东沦陷后,他便遭到国民党宁县政府的搜捕。5月,其子占邦在西华池三楞嘴战斗中英勇牺牲,年仅23岁。8月,他身陷囹圄,敌人逼迫他发表拥蒋反共声明,劝四子占祥携带枪支投降,但他始终坚贞不屈。他在狱中身受摧残,忧郁成疾,病情日笃。因无口供,敌人只好准他取保就医。出狱后,他卧床不起,于1949年5月含恨而逝,终年70岁。临终前他嘱咐诸子:“不要动摇,跟着共产党、毛主席,革命到底……”。

徐廷昌一生向往光明,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,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,投身民主政权建设,无怨无悔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、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,做出了不可磨灭、令后人永记的贡献。

· 珍赏 ·

南朝青瓷蟾蜍形烛台

□李玺清

我国古代,人们都是以蜡烛或油灯照明生活,“盘龙移绣柱,倒凤照琼妆。独觉丹心苦,空徐玉箸长。得钱频送喜,吐桂欲生香。寄语东邻子,何妨借壁光。”明代戏曲家、诗人韩上桂的这首《烛》,形象地描绘了古人夜里燃烛照明的情景。2004年3月,武汉市江夏区龙泉乡南朝古墓出土的一批随葬明器中,有一件青瓷蟾蜍形烛台造型独特,极具特色。

这件南朝青瓷蟾蜍形烛台(附图),现收藏于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。烛台以灰白色瓷土雕塑而成,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。上部是一长方形几案,上面排列五盏竹节形小管,应该是用来插放蜡烛;中部是莲花座上托一方形座,长方形几案就镶嵌在方座中部,十分牢固;下部的底座是一只蟾蜍,正在匍匐前行。蟾蜍头部微微昂起,双目凸出,注视前方。粗短的前腿撑起身躯,脚趾张开,张嘴吐舌,憨态可掬,似乎正在负重爬行,显得自然生动。蜡烛主要用于照明和礼佛,蜡烛和烛台同时亦是古人祭祀必不可少的用具之一。蜡烛最早出现于东汉晚期,随着逐渐被人们使用,烛台应运而生。据考古资料显示,三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青瓷烛台,以动物造型居多。到了南北朝时期,烛台式样更加丰富,主要有羊、狮、蟾蜍及单管、双管、四管、五管、荷花形等。

蟾蜍俗称癞蛤蟆,皮肤粗糙,背部长满大大小小的疙瘩,这件背负供台的蟾蜍背部,布满细



小的疣粒,体现了蟾蜍的特征。由于年代久远,器身上有一些地方泛着青绿苔迹。

蟾蜍虽然其貌不扬,甚至有些丑陋,但它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,它一夜咬的害虫往往是青蛙的几倍,被视为庄稼地里的卫士。蟾蜍还有着一些吉祥寓意,如三条腿的蛤蟆被称为“三足蟾”,传说它能口吐金钱,是旺财的动物,而蟾蜍身上遍布的疙瘩仿佛金钱珠宝一样,故有招财进宝的寓意。古语云:家有金蟾,财运绵绵。金蟾代表着富贵财气,民间就有“刘海戏金蟾,步步钓金钱”的传说。在汉族神话传说中,月亮里有三条腿的蟾蜍存在,因而月官亦有蟾官的别称,古人以“蟾宫折桂”来比喻科举高中,从此官运亨通,前程似

锦,所以蟾蜍亦是古代读书人书房里吉祥雅物,三门峡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件宋代蟾蜍形青瓷水盂;蟾蜍亦是镇宅祛邪的象征,能够帮助抵挡噩运,保佑平安健康,故民间素有以蟾蜍摆件镇宅旺铺的习俗;蟾蜍因繁殖能力和生命力强,在民间另有多子多孙、儿孙满堂、长生不老等寓意。正是因为蟾蜍自身有着诸多美好寓意,所以古代考古发掘出来的一些器物上,很多都带有蛙纹。流传至今的一些古代陶瓷、铜、玉、竹木等蟾蜍的艺术造型,或背负钱串,或口含元宝,或卧于金钱元宝之上。这件烛台以蟾蜍作为底座,与我国民间对蟾蜍的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,虽然南北人民的正常往来被阻隔,但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却十分密切,佛寺广建,佛事大盛,唐代诗人杜牧诗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就是这一时期佛教兴盛的生动写照。这件青瓷蟾蜍形烛台中部莲花座的艺术设计,更是融佛教文化于其中,其随葬于墓中,体现了当时人们信佛成仙的思想,而蟾蜍因自身所具备的诸多吉祥寓意,蟾蜍造型的青瓷亦是这一时期被使用的随葬明器。此器设计精巧,造型简练,令人不禁想起元代诗人卢琦吟咏烛光“银台照夜春溶溶,金屏绣褥光相射”的诗句;蟾蜍形象逼真而又夸张独特,雕塑手法简洁明快,线条流畅,古朴庄重,展现了南北朝时期青瓷制作水平的精湛。

· 丝路览胜 ·

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

□曹鹏雁



民国33年修永宁大桥

徽县永宁镇

永宁镇位于徽县东三十五里,中华山南麓、永宁河西岸,今名永街村。镇名在唐以前暂未

见史书明确记载,依据徽县博物馆藏“乾道八年大宋国凤州河池县永宁乡xx社朱从然”墓券以及近年出土的“大宋嘉定十七年利州西路凤州河池县永宁乡长峪社李林等”墓券推知,永宁镇在南宋时为永宁乡。元初,河池置南凤州后,于永宁乡置永宁县,至元七年(1270年)省入徽州。明、清时为永宁里,清末至当代为永宁镇。明代嘉靖四十二年郭从道《徽郡志》(建置志)记载“永宁铺,东三十里。”清代嘉庆十六年徽县令张伯魁《徽县志》(疆域志·里志)记载“城东十五里柏树崖,又五里二十里铺,又二十里永宁镇。自镇东逾河,经玉堂山,二十里杏树崖。又十里,至簸箕湾。距城七十里,交两当县界。”清代乾隆版《徽县志》与嘉庆版《徽县志》及民国二年赵钟灵《徽县新志》记载:“玉堂山,东五十里,脉自簸箕湾西南亘二十里,至永宁川而止。”

永宁镇及永宁渡口秦、汉时期为故道、陈仓道所经之地,明、清时代,徽县东境有官道经永宁铺、玉堂山通两当、凤县。1936—1938年修筑的“华一双”(华家岭—双石铺)公路沟通了甘肃陇东南与陕西的联系,1949年以后“华双”公路被提升改造为国道316线。

永宁河在镇东玉堂山下流过,清代顺治七年杨三辰《江河纪略》记载:“徽东之永宁河也,源发于秦,一自新店窑,经百纳峡入永宁,是为中股;一自娘娘坝,经兰柴庙归入永宁,是为左股;一自王家楼透入墨磊山,经高桥下河注于永宁,是为右股。三水总汇永宁,浸成大河,乃克载空舟,下至合河口。”2003版《徽县志》记载“永宁河,系嘉陵江上游较大支流,为徽县第二大河,发源于县西北部边境与天水市分界线的大梁山北坡,自天水娘娘坝、李子园、

党川、马家坪流入徽县太白、柳林、永宁等乡镇,于嘉陵镇的火焰山脚汇入嘉陵江,全长144公里。永宁河在徽境内长68公里,年径流总量5.11亿立方米,年输沙总量134.27万吨。境内多年平均侵蚀模数676.8吨/平方公里,年侵蚀总量55.68万吨。”

永宁镇耕地广阔,是徽县重要的产粮区,素有“永宁熟,徽县足”的说法。永宁镇历史上商旅发达,物产富饶,经济繁荣,其交通区位与经济总量至今不可小觑。目前遗留的文物古迹点有创建于明代的中华山道观与三泉寺,始修于民国26年(1937年)并于民国33年9月翻修的钢筋混凝土排架肋桥,清代道光二十一年九月(1841年10月)由徽县知县郭宏熙为平息永宁渡口争讼而刻立的《永远遵行》官方收费章程碑等。(连载十一)

红军长征路上的“春晚”预演

□周文洋

1935年1月24日,红军攻克赤水东岸重镇土城,缴获了大量年货。中央军委纵队“干部休养连”也分到了肥猪、鸡鸭、腊肠等。

“干部休养连”是中央军委长征出发前临时组建的一支连队,由学者、作家、文艺工作者、女红军等有特殊学问、技能的人才组成,其中有被称为红军“四老”的董必武、徐特立、林伯渠、谢觉哉等文化、教育界的前辈,有文学家成仿吾、冯雪峰,画家黄镇、王直等,还有享誉“赤色戏剧家”的李伯钊、“舞蹈明星”危拱之、“山歌百灵”王泉媛等30多位能歌善舞的女红军,由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兼任连长。

炊事班为全连做了一顿富有黔北风味的红烧肉、官保鸡、清蒸鸭等“六碗菜”。吃过饭刚渐天黑,李坚真带人燃起两大堆篝火,大家三、五成群地围拢过来,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:“滔滔乌江急又深,手拉手来心连心。红军百姓团结紧,不怕敌人百万兵。”

听到歌声,驻守在附近的红军战士,当地的群众纷纷走来,在篝火旁围成了一个大大圆圈,歌声刚落,众人齐喊:“再来一个!再来一个!”

李坚真又唱完一首《歌唱红军英雄汉》,大家还要求再唱时,她高声说:“大家欢迎我们的‘舞蹈明星’危拱之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?”

在一片叫好声中,危拱之走入场内,步伐轻盈地跳起《水兵舞》,又唱了一首自编歌词的“风阳花鼓”:“咚咚锵、咚咚锵,红军强、红军强,千难万险无阻挡,行军路上揍老蒋,北上抗日打东洋。”

“山歌百灵”的王泉媛也走到篝火旁,用明亮的嗓音唱起山歌:《苗家救星》《一举一动为穷人》。

这时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10几位军委首长走进人群,他们此刻心情格外舒畅,因为在刚刚结束的军委会议上,制定出一个新的战斗方案: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一带集中优势兵力,伏击尾追的国民党部队。

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大声说:“我们尊敬的‘四老’虽不善唱歌跳舞,但他们朗诵诗、讲故事同样吸引人,欢迎大家欢迎‘四老’表演节目。”

先是董必武在掌声中上场,激情满怀地朗诵了一首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接着林伯渠、谢觉哉每人讲了一个故事小段。轮到徐特立出场,只见他反穿羊皮袄,头戴破毡帽,慢慢悠悠地走上来,站在那里并不说话,认真地把手伸进皮袄,上抓抓、下挠挠,右一摸,左一摸,忽然似乎捉到什么个东西,放进嘴里使劲咬一下,自语道:“喂,这个肥。”他见人们都未解其意,又把动作重复一次,说:“李伯钊跳了‘水兵舞’,我演的是‘捉虱子舞’。”大家才明白是捉住虱子放进嘴里咬死的动作。

那时,红军不分白昼地行军打仗,根本没时间和条件洗澡,几乎人人都生虱子,叮在身上刺痒难耐,只得趁休息时伸手在衣服里摸虱子,摸到后解恨似的咬死。徐特立用哑剧形式滑稽地表现捉虱子,让大家爆笑如雷……接着,军委干部团团长肖劲光表演了洞箫独奏《苏武牧羊》《高山流水》,军委翻译伍修权跳起《红色机器舞》《丰收舞》等。

演出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,被战士们尊为“红军大姐”的蔡畅站起来说:“再过一周就是大年三十,我提议把今天的节目再充实、再排练,除夕夜举办一场联欢会,庆祝胜利、欢度新春,今天就算春节晚会的彩排!”,提议赢得热烈掌声。

1935年1月28日,红军在青杠坡战役中失利,毛泽东下令各部队向川、滇、黔三省结合部转移。2月3日(农历年三十)傍晚,“干部休养连”刚刚到达四川泸州石厢子村,就忙着帮助野战医院收集门板、搭建病床、照顾伤员。而渡过赤水的将士们也疲惫不堪,情绪低落,谁也没时间、没心思提起“春节晚会”。

长征途中首次举办的“春晚”预演,充分展现出红军将士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,坚定的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在恢宏壮丽的长征乐章中,谱写出一节欢乐、愉悦的音符。